



圣西门选集

下 卷

何 清 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圣西門选集

下卷

何 洁 新 譯

壹 叁 貳 拾 貳

1984年11月

目 录

論实业制度	3
一、序言	3
二、导論	13
三、上国王书	17
四、致人类之友书	37
《論波旁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續篇	62
实业家問答	75
論文学、哲学和实业	169
一、适用于十九世紀的某些哲学論点	169
二、論社会組織	197
新基督教	225

附 录

圣西門传略	271
圣西門的主要著作	288
注释	293
有关研究圣西門的文献	300
人地名对照表	306

論实业制度⁽⁷⁵⁾

一、序言

政治机体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危机的基本原因，就是目前在各个最文明民族中迅速蔓延的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这一变革是旧政治制度迄今不断经历的那些变化的最终结果。更确切地说，这一危机的本质就是从封建和神学制度向实业和科学制度过渡。只要新的制度尚未完全形成，危机就必然继续下去。

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至今都同样没有明了这些基本真理，而且现在仍然如此，或者更坦率地说，两者都只是模模糊糊地、一知半解地、极其不充分地理解到这些真理。十九世纪仍然受着十八世纪的危机性质的支配，它还完全没有具备自己固有的组织特性。这就是危机和至今一直伴随着它的严重灾难如此长远地拖延下来的第一个真正原因。但是，一俟我们理解到文明的进程为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一俟目前就应当开始发挥作用的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摆脱无所事事的状况，这一危机就必然停止，或至少可以变成简单的道德运动。

我现在公布一部哲学著作的第一片断，这部著作的总目的在于：发挥和证明我以前只作过简单陈述的重要原理；尽量唤起人们普遍注意交给十九世纪来完成的社会伟大改革的真正性质；证明为文明时期迄今的整个发展阶段所逐渐准备好了的这一改革，现

在已經完全成熟，再拖延下去就会带来最惨痛的后果；明确地指出应当使用什么方法来和平地、有把握地和迅速地进行这一改革，而不管它会遇到任何实际的障碍；一句话，就是尽哲学的全力来促进实业和科学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只要把这一制度建立起来，就可以永远结束现在的社会动荡的局面。

如果大多数有識之士都努力来掌握和討論实业学說（我早就大胆地担負起創立这一学說的責任），它就能够容易被人理解，而且不必費太大的周折就被接受。但是非常遺憾，情况并非如此。根深柢固的习惯思想，几乎妨碍着所有的人理解这一学說。^① 培根所說的白板（*tabula rasa*），对于掌握政治思想來說，比掌握其他任何思想都更为重要。人在掌握这一范畴的思想方面，当然要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以前学者們企图凭借用占星术和炼金术的观点来研究天文学和化学的老法正确地理解天文学和化学，他們曾經遇到許多的困难，这种困难目前在政治学方面也可以见到。在政治学当中，正发生类似的变革。即从占卜科学向实証科学过渡，从形而上学向物理学过渡。

我不得不同頑固的和普遍存在的习惯作斗争，所以认为出面反对这种习惯，略微提前公布我的著作的一部分，是有好处的。我觉得，在这里用一般方式简单地說明一下空洞的和形而上学的学說至今对政治发生和现在还保持着什么影响，說明什么錯誤迫使人們把这些学說誤认为真正的政治学，最后指出现在为什么必須

① 因此，我认为通常不研究政治的人最能够（在其他条件完全相等时）理解我的著作，并且一般也象討論所有的实証政治思想一样来討論它。

放弃这种学說，这也是有好处的。

实业和科学制度，在封建和神学制度占有統治地位的时期，就在产生和发展。这种简单的对照說明，就足以使人理解这两种針鋒相对的制度之間应当存有某种中間的、不固定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唯一使命，就是逐漸改变旧制度，使新制度发展，然后实现向新制度的过渡。根据我們列举的材料預先解决这个一般历史事实是非常容易的。一切变革，不論是世俗权力方面的变革，还是精神权力方面的变革，都只能逐漸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变革是伟大的，另一方面封建和神学制度由于它們的本性而反对任何改革，以致为了实现任何一种改革，都需要在旧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各个特殊阶级繼續进行几世紀的特殊的活动。这些阶级虽然由旧制度产生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制度的影响，它們应当依靠自己的政治存在这一事实，在社会内部創造被我抽象地称为中間的和过渡的制度。这些阶级在世俗权力方面就是法律家，在精神权力方面就是形而上学家；他們在自己的政治活动当中彼此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就象封建制度和神学之間、实业和实验科学之間具有密切的联系一样。

我方才指出的一般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实証的政治学說应当依据的主要材料之一。在目前來說，闡述这种政治学說特別重要，因为政治方面至今存在的模糊不清的东西，现在对政治思想方面的混乱起着最大的作用，几乎政局的一切动蕩都是由它所引起的。

不承认法律家和形而上学家起过卓越而有益的影响，这完全是一种不从哲学上来看問題的态度，因为他們削弱了封建神学制

度，防止了这一制度把实业科学制度扼杀在搖籃里。我們应当把消灭封建的司法制度以及建立迫害性較小和比較有組織的审判制度归功于法律家。在法国，議會的活动曾多次保护实业，使它免受这种封建制度的侵害！責备这个等級具有野心，就等于指摘有用的、合理的和必要的事情的必然后果，就等于回避問題的实质。至于形而上学家，我們认为他們在十六世紀进行宗教改革和建立破坏神学权力基础的信仰自由原則方面，也是有功劳的。

如果繼續討論这一个对每个有健全思想的人根据上述說明很容易理解的思想，我便离开了序言的范围。我代表自己声明，我完全不能想象沒有法律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参与就可以改革旧制度和发展新制度。^①

另一方面，如果說把法律家和形而上学家对文明进步作出的特殊貢獻一概抹煞是不合理的，那末过高評價这种貢獻，或者更正确地說，不認識这种貢獻的真正本质，也是十分危險的。有人根据法律家和形而上学家的政治影响的历史作用，說这种影响必然是短暫的，因为它沒有組織过渡本身，只是改变过渡的形式，使过渡容易了一些而已。他們从旧制度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分权力，而新制度的力量無論从社会的世俗权力方面或精神权力方面取得实际优势的时候起，就完成了自己的天职。直到上一世紀的中叶，法律家和形而上学家的政治活动都是有益的、受人尊敬的，而当

① 事物的本性要求过渡阶段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甚至用純科学問題的討論方法就可以发现它。哪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理学家不知道人类理智很长时期以来在沒有从純神学观念过渡到实証观念以前就本部門中使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呢？难道不能使每一个研究过科学发展的人相信中間状况对于这一过渡是有好处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嗎？

他們的政治活動超出它的自然界限的時候，就產生了完全有害的性質。

當法國革命宣告開始的時候，問題已經不在於改革幾乎完全喪失了自己的實際力量的封建神學制度，而在於組織根據文明的現況負有代替封建神學制度的使命的實業科學制度了。因此，各有自己天職的實業家和學者，應當登上政治舞臺。結果並沒有如此，而是法律家成了革命的首領，他們根據形而上學家的學說來指導革命。不必回憶什麼可怕的混亂是由於此造成的，以及在那種混亂之後出現了什麼不幸。但是應當特別指出，儘管進行了如此巨大的試驗，國務工作仍由法律家和形而上學家領導，一切政治糾紛現在全由他們解決。

有一種偏見，認為法律家和形而上學家的學說優越。法律家和形而上學家便依靠這種偏見而利用他們的廣泛的政治影響。如果不能用直接的分析證明剝奪他們的這種廣泛的政治影響是絕對必要的，上述的那種價值很高而且實際上大大深入人心的試驗，便要由於自身的混亂，仍然不能收到成效。但是，可以非常容易地證明，法律家和形而上學家的學說，按它們的本性來說，目前完全不能以應有的方式指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政治活動。這種情況十分重要，以致它可以完全貶低個別人物可能發揮的作用，不管他們的才能是多麼卓越。

每一個受教育不多的人，現在都清楚地知道，必須全面地改革社會制度，因為改革的需要已經成熟到人人都必然發覺的地步。但是這方面有一個主要錯誤，那就是相信法律家和形而上學家的學說應成為建立新制度的基礎。這種錯誤所以受到一些人的支

持,只是因为人們沒有在自己的政治观察中进行足够的深入研究,沒有充分仔細地研究一般事实,或者往好一点說,只是因为政治結論仍然不是依据一般历史事实做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人們就不致迷誤得把社会制度的形式变化看成是真正的改革。这种形式变化早已發揮了它的全部作用,今后不能再发生任何影响了。

法律家和形而上学家总爱把形式当作内容,把空談当作行动。因此,普遍产生一种看法,认为政治制度几乎是多得不可限量的。但是,事实上只有而且也只能有两个真正彼此不同的社会組織制度:封建軍人制度或实业制度。而在精神权力方面,則为信仰体系或实証体系。毫无疑问,文明人类的生活,在它的整个过程中,都是按照这两种伟大的社会制度来划分的。无论是每个人,或者是一个民族,都只有两个活动目的:不是征服他人,就是自己劳动。而在精神世界方面,适应于这两个目的的,是盲目的信仰和科学的証明,后者也就是以实証观察为基础的証明。因此,必須改变共同活动的目的,以便确实改变社会制度。一切其他改进,尽管意义十分重大,但不外是形式上的改变,也就是只改革形式,而沒有改革制度。只有形而上学才会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因为它的能力很差,把应当分开的东西結合起来了,而把应当結合起来的東西又分开了。

在封建制度或軍人制度完全占有統治地位的时候,社会的組織十分明确,与众不同,因为当时它已为自己的活动提出清晰而明确的目的,即大力发展軍事活动;政治机体的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协调起来以便达到这一目的。目前,社会也打算按照更加完全的形式,相当明确地、与众不同地組織起来,以开展实业活动为目的,

社会力量之間的一切联系，也要面向这种活动。但是，从封建制度或軍人制度瓦解以来，直到目前，社会还没有被真正組織起来，因为上述的两个目的同时并存，而政治制度的性质也很混乱。但是在目前，当过渡时期大致就要結束的时候，再认为过渡状态或者准备状态仍象經常的政治制度那样有益和必要，那就显然是荒謬絕伦了。然而，法律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学說却正在往这一方面发展。

反复說明社会的活动必須要有目的，沒有目的就不能有任何政治制度^①，这样做是沒有必要的。况且，法制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只能是一种手段。如果等到文明取得了一切成就之后，人們才开始結成以规定彼此共同遵守的法律为目的的社会，这难道不使人感到奇怪嗎^②？毫無疑問，这是一种故弄玄虛的极端表现。这

① 波拿巴懂得这一基本真理，所以恢复了封建和神学制度。他只是不正确地应用了这一制度，这是因为他沒有才能。他的才能远不如他的野心，也就是說，他所受的教育只能使他知道一个文明民族的元首现在应当根据什么方向行事。在我們这个时代，野心家如果感到自己无能，就会变成一个軍人，而如果觉得自己有才干，就会成为一个实业家。

② 毫無疑問，人們会对我們說，根据这一假說，社会契約的目的是保証自由。但是，这表明要經常在同类观念里打轉轉，把过渡状态誤认为是必須建立的制度。

只要封建神学制度还多少发生作用，保証自由就应当成为当务之急，因为那时自由会受到严重而不断的侵犯。但在目前，当建立实业科学制度的时候，就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了，因为人們深信这一制度必然在世俗和精神方面达到最高的社会自由。在这种制度下，再設立复杂的政治机构专去保卫实际上不会再受侵犯的自由，这就很象唐·吉訶德先生同风車作战了。但是，保証个人的自由也不能成为社会契約的目的。正确理解的自由，是文明进步的結果，而且也 and 文明本身一样，不能成为文明的目的……人們不是为了成为自由的人而联合起来的。野蛮人为了共同打猎或进行战争而联合起来，当然不是为了保証自己得到自由而联合起来，因为他们要想自由，最好是各自为政，彼此独立。我再說一遍：活动要有目的，而自由不能成为目的，因为自由要以这种目的为前提。真正的自由完全不在于社会成員可以隨意游手好閑，无所事事；凡是有这种倾向的地方，就应当严厉地加以制止；恰恰相反，自由在于尽可能广泛地、不受任何阻碍地发展人們在世俗和精神方面有利于社会的才能。

種情況同目空一切地集合在一起，制定新象棋比賽規則然後以競賽者自居的人，難道有所不同嗎？這種荒謬絕倫的行為，對於因為只習慣於觀察表面現象而喪失了判斷力的法律家來說，卻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值得寬恕的事。但是，對於習慣於觀察一切事物的本質的實業家來說，如果仍有這種謬見，那就完全不可饒恕了。

此外，我們還要指出，隨著文明的進步，精神和世俗方面的廣義分工也將同樣地發展起來。由此必然產生如下的情況：人們日益減少彼此之間的個人依賴，但每個人對於全體人的依賴却要逐漸增加。如果我們仍然把自由當作政治學說的基础，那末，目前對於自由所持的空洞的形而上學看法，就要限制全體人對於每個人的影響。從這個觀點出發，自由也是同文明的發展相抵觸的，妨礙著建立組織良好並且要求各個部分之間具有密切聯繫和依賴整體的制度。

我所說的也不是政治自由，因為十分顯然，與個人自由比較起來，這種自由更不能成為社會聯合的目的。但是，為了說明事物的真實情況，我在這裡可以指出，最能充分和令人信服地證明政治觀念現在仍然是空洞無物和含糊不清的，就是只在理論上承認每個公民不同能力如何都具有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把這種權利看作是自然權利，但是在實踐中，這項權利的行使又受到限制，同時也不考慮公民的能力。如果沒有這種情況，那末总有一天會宣布：政治判斷既不需要天賦能力，又不需要后天能力！不錯，還沒有直接這樣宣布，不過這樣宣布出來，毫無疑問是有意義的。

即使繳納一千法郎直接稅的法國人在他們認為困難和重要的政治方面也建立起化學方面的那種原則，人們為什麼不說他們能夠作出化學上的發現呢？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化學工作所需要的能力已經盡人皆知，而政治所需要的能力却還沒有人知道。這種差異的原因是什麼呢？這是因為化學現在已經是實證科學，而政治學只是不配稱為科學的占卜學說。

形而上學不傳授任何實際東西。正因為這樣，它就必然硬說，人們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科學訓練就能夠作到一切。我們所指出的這一值得注意的情況，目前只存在於政治學及其母體——哲學當中，因為在我們的一切知識部門里，只有政治學和哲學目前仍是形而上學的。但是，在目前已經完全成為實證科學的一切科學部門里，當它們還有一部分被形而上學的黑暗陰影包圍的時候，還可以看到某種類似現象。要想有權研究科學，都需要一些什麼能力呢？只有在科學具備了實證性質或實驗性質的時候，才能明確地解決這個問題，使它永遠不再成為爭論的對象。在政治方面，情況也一定要如此。現在，仍然有人堅信人們天生就有政治知識，或者認為法國人生來就能判斷政治問題，而且這種看法可以不被嘲笑。甚至有人認為這是愛國行為。只有當政治上升到實證科學的階段（現在已經不能再拖延了），才能明確和肯定政治工作所需要的能力的性質；那時，只委託能使饒舌者啞口無言的特殊學者階級去從事政治活動。

我們現在回头研究对待事物的正确的观点。我們承认，法律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影响，很长时期以来都是很有益处的，因为这种影响改革了封建神学制度，从而便利了实业科学制度的发展。但是我們也承认，由于后一制度的发展，法律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影响，在他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以后，就不再发生作用了，所以这种影响目前已經毫无益处，即旧制度已經变得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具有充分的力量成为社会的基础了，而新制度又发展到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掌握整个社会机构的地步。法律家和形而上学家保护萌芽时期的新制度，反对风烛残年的旧制度。但是，当儿童长大了，而成年人变成老年以后，一切干涉都沒有好处，甚至反会有害，新人也一定会直接同老人达成協議的。

实际上，法律家和形而上学家目前在新旧制度之間所起的中介作用，是政治观念陷入无法摆脱的混乱状态的主要原因；他們的这种作用妨碍着实业制度的到来。但是，只要消除这种中介作用，只要在两个互相斗争的制度之間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一切混乱现象就会象魔术一般烟消云散。那时，人們将会互相解释和彼此了解，他們不会再认为社会沒有活动的目的也能存在。因为社会不会再象以往那样以战争为目的，所以人們将会承认，应当毫不延迟地組織以实业为目的的社会。封建阶级和神学阶级将会明白，他們沒有任何方法能同实业家和学者抗衡，以阻止新制度的彻底建成。在实业家和学者这方面，也会了解他們应当帮助旧阶级登上新的政治舞台，以补偿这些阶级在失去政治上的紅运后所受的損失。

我在这里对于构成我的研究对象的基本事实說得或許过多

了,但是由于这个事实对于了解政治观念十分重要,所以我不以闡述的冗长为憾。我希望这种叙述的冗长能使讀者容易理解我的著作,向讀者正确地指出我的著作与一般公认观点的不同之处,因为这一著作的主要目的,是比較精确地(用其他任何办法我都办不到这一点)规定实业制度的真实性质,說明它与可悲的自由制度的根本差异。有些人喜欢把我的制度同自由制度混为一談。一句話,我打算把根据互相協調的許多共同历史事实建立起来的科学政治学,同那以有点模糊不清、毫无内容和只具有神学的种种色彩的抽象假定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政治学分开。

在以上的叙述当中,我只从主要学說应该更換的观点出发,考察了社会目前应当进行的伟大的道德运动。但是,也还有一种观点,我应当在这个序言里略为說明一下。

观念和情感必然互相联系,彼此适应。观念方面的一切伟大运动,都将在情感方面引起同样的运动。从这种观点来說,爱人类是一切哲学的共同之点和必要的助手。为了引起以改变一般观念为目的的伟大的哲学运动,就必须使所有能够向善和怀有高尙情感的人积极培养自己的博爱的感情。旧的主要学說的衰落,使利己主义发展起来。这种利己主义日益敗坏社会,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新学說的形成。为了同利己主义作斗争,并把它打得粉碎,就必须培养博爱的感情。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哲学工作,它甚至应当超过哲学工作的重要性。正因为这样,我才在自己著作的这一部分中为自己规定了如下的任务:向人类之友呼吁,即向一切怀有崇高而善良的情感的人呼吁,而不管他們的社会地位如何,也不管他們是拥护旧制度还是拥护新制度,或者是拥护过渡性的

制度。我將以《致人類之友書》結束這部著作。

二、導論

兩個政黨為了全面掌握政權進行着激烈的鬥爭，每個政黨都根據不同理由認為權力是自己的天然財產；政府竭力保證自己不被這一黨或那一黨所陷害，但認為自己有責任滿足這兩個黨的貪欲，把執政的好處比較平均地分給兩個爭權奪勢的階級；最後，深受雙重壓迫之苦的各種實業家，即農夫、工廠主和商人們，都衷心地希望不再成為各種陰謀詭計的犧牲品，但是他們沒有任何明確的觀念，沒有掌握這一觀念的任何決心，所以仍然處於冷眼觀看所發生的各種鬥爭的地位，天真地期待那部分製造或急欲製造陰謀詭計的人會大發善心，使他們擺脫這種處境——這就是擺在一切公正不偏和有教養的觀察者面前的現代政治生活的全景；革命的悲慘後果迄今都是這樣的。在革命之初，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革命希望組織經濟的自由制度，這種制度的直接的和唯一的目的，是保證勤勞的生產階級得到可能有的最大福利。就我們目前的文明條件來說，只有生產階級才能組成真正的社會。

是什麼原因使我們的革命離開了它的最初目的，把社會帶到目前所處的悲慘的境地，並使它停步不前呢？有什麼辦法可以使社會擺脫這種處境，建立鞏固的秩序和長遠的幸福呢？這是兩個互有密切聯繫的一般性問題。我現在來說明第一個問題。

我希望讀者首先注意的本書宗旨，是使王權的利益同實業家

的利益接近，或者往好一点來說，是使双方的利益統一起来。我到处宣传这个宗旨。把这两种力量結合起来的想法，是我在著作本书时支配着我的思想的观念。如果我能使实业家也象王权的真正朋友一样特別关心这一要点，那就算达到了我的最重要的目的。

为使有利害关系的两党能够了解上述的結合的全部重要意义，我十分願意向它們指出：(1)革命离开原来的目的，主要出于王权和公社所犯的錯誤，即因王权在召开三級會議之后不久，就使自己同公社分离了，而公社則使自己走上敌視王权的道路，沒有使双方的政治力量團結起来，而这种團結对于双方的好处，已經受过几个世紀的考驗；(2)因此，在目前条件下，無論是王权还是公社，最必要的工作是立即开始这种合理的團結。

我曾向王权指出：革命的真正目的至今所以还没有达到，正是因为这一目的已被提出，而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障碍却还没有清除，所以革命的目的繼續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它的全部力量和整个规模。这是因为：政治組織的各种需要也和个人的需要一样，只要沒有得到滿足，便将繼續存在，而且这种需要越是长久地不能得到滿足，它就表现得越是强烈。由此可见，革命还远远沒有完成，只有完全实现事件的整个进程为革命规定的目的，即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以后，革命才算完成。

任何人力都不能使这种自然运动倒退，或者使它半途而废。出来領導这一运动，这对于王权可能最好处。

其次，我在探討王权的本身的和直接的利益时将要証明王权存在的絕對必要性，这可使王权立即决定尽快地和全面地同实业家團結起来，因为只有实业家才能真正保卫王权不受拿破侖封建

主的侵犯。我还要指出，政府不相信實業家對於以目前王朝為代表的政權的忠誠，這是毫無根據的。從實業家的地位的本質來說，他們是擁護秩序的，而且在政治方面，除了建立經濟的和有利於實業的管理制度以外，他們再沒有任何其他的希望，所以沒有任何根據使他們產生哪怕是微小的改變王朝的野心——只要王權明確地表示願意同他們結成同盟，讓兩個至今依靠他們生活的不勞而食的階級各行其事。從此以後，實業家就會使野心家無法實現他們企圖推翻王朝、把自己中意的人物擁上王位的一切陰謀。

另一方面，在我向實業家呼喚時，將對他們指出，他們表現自己的政治積極性或為本身的共同利益直接服務的時機已經來臨，他們不再乞求外援（研究實驗科學的學者除外，他們應當認為自己與學者屬於同一團體）的時期就要到了；並且向他們證明，他們從革命開始以來所遭到的一切災難的第一個和共同的原因，就在於他們不親自參與政治，總是委託法學家來保護他們的共同利益。我要設法使他們相信，不依靠自己而希望仰仗他人來實行旨在為文化、實業和商業造福的經濟制度，那是十分愚蠢的，因為只有他們自己才有建設這種制度的真心和能力。我也要設法使他們相信，目前他們的被動無為，是應當立即克服的唯一的實際障礙，因為他們的力量，在一切方面和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決定性作用。

我由此得出了下述結論：如果王權了解到自己的最重要利益，決定採取必要的措施來吸引實業家參加政治活動，那末實業家就會毫不猶豫地、信心百倍地走上為他們指出的道路。否則，王權的利益也要象實業家本身的利益一樣，迫使實業家把這方面的主動權操在自己手裡。不論是在前一場合，還是在後一場合，實業家的

第一个政治行动，都应当是郑重地和坚决地声明他們毫无条件地希望王权保持在波旁王朝的手里。这项可以粉碎野心家取得胜利的一切希望的声明，对于挫敗他們的可耻阴谋是很必要的。我要向实业家指出，波拿巴分子設法叫你們相信波旁王朝打算延續自己的非法政权，这完全是胡說八道的成见，因为波旁王朝自然最希望天下太平，政权安然无恙（这是实业家的保护完全可以向他們担保的），而不想把政权扩大到超过社会的目前需要的限度。

本书对实业家和王权所作的共同結論是：这两种力量最希望联合起来；应当尽快地和全面地完成这两种力量的联合。

但是，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人們經常向政府和人民提出一些建議；虽然这些建議十分正确，可是沒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它們不够明确，沒有指出可以立即采取的实施办法。因此，我认为在